

当今全球政治伦理的困境与变革^{*}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思考

王 超

【内容提要】作为始终处于变动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政治伦理，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交往关系扩大化，其初期表现是近代以来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的民族性、区域性政治伦理的形成及向全球扩展，并由于其自私的本性而受制于自身局限，在当代因无法兼顾同质化与多元化并行的世界总体趋势，而遭遇种种困境和挑战。“一带一路”所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改革开放的实践推进和逻辑延伸，它使有关国家受惠于中国的发展机遇，因而包含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蕴，为推动全球政治伦理变革提供了建构方案。

【关键词】全球政治伦理 “一带一路”倡议 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王超（1990-），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重庆 400044）。

全球政治伦理意为在面临或处理关乎全球性事务之时，不同社会实体如政府、公司、组织、个人等所应遵循的制度规范、价值理念或原则。在当代，全球政治伦理面临严峻挑战及进一步变革的契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开放的实践推进和逻辑延伸，是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走向世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形成的重要表现。

一、全球政治伦理的历史生成

政治伦理本质上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包含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多重内涵，并在实践中衍生出家庭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政治交往关系等外在表现形式。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人们劳动过程中结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在众多交往关系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范围等决定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及其所衍生出的伦理规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

1. 古代区域性政治伦理及其特点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普遍处于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定义的“人对人的依赖阶段”，

^{*}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2017ZDZT28）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认同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研究”（12&ZD006）的阶段性成果。

其特点是“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导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主要局限于以民族为主体的地域性发展上。整个社会以“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②，为人们提供价值指导和秩序约束的政治伦理由于众多民族主体、阶级差别和区域差异而呈现“多元类似”，以及总体类似与局部量变交叉呈现等特点。

从政治伦理的内向发展而言，该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处理内部关系所采取的家庭伦理标准和政治伦理取向是存在差异的，但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对落后性，人们尚未完全摆脱对自然的心理依赖，尚未实现对自然的科学认知。借助对自然的盲目崇拜及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之时积累的经验教训，不同社会的政治伦理理念具有与区域文化相互渗透的一般性特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因此，把‘习惯’（ethos）一词的拼写方法略加改动，就有了‘伦理’（ethikee）这个名称”^③，以宗教、习俗、文化、政治法律等形式构建阶级的政治伦理规范是该时期不同社会的普遍做法。同时，关注个人“善”以及共同体利益，进而对政治生活进行理想化的憧憬，超现实性是人类早期政治伦理一般性特点的另一重要表现。柏拉图基于雅典民主制的利弊，认为统治或治理城邦者必须是有德之人，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城邦“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④，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是城邦发展所需要的个人美德。与此相类似，早在西周时期的中国已经具有“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伦理理念和准则。此类政治理想主义说明该时期政治伦理化倾向极为明显，并对现实政治具有强烈的软约束力，促使“实然”（现实存在的）政治以符合“应然”（以价值理念形式存在的）伦理作为自身的合法性依据。随着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建设的健全和完善，政治伦理制度构建和价值追求的现实指向性不断凸显——其存在的目的由于日益受到统治阶级的垄断而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亦即政治伦理的意识形态工具化。西欧中世纪转向神性政治伦理，中国封建时代“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即是伦理政治化倾向的重要表现。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实然”存在的政治与“应然”存在的伦理之间关系发生了颠倒，伦理制度规范和价值理念日益成为现实的阶级统治的附庸和“婢女”。

从政治伦理的外向延伸来看，在近代以前，一个成熟社会的政治伦理虽然能够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向外传播并寻求他者认同，但人类不同社会共同体之间受到交通工具落后、交往需求匮乏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和制约，民族性或区域性政治伦理主要以本国、本阶级内外的军事冲突、战争等激烈的交往方式，或通过政治合作、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等渐进形式向外扩散，如欧洲政治伦理的变迁、伊斯兰文明发展过程中宗教的扩散、传统中国儒家伦理观对东亚政治伦理秩序的塑造等。它们更多地表现为文明对外扩张或文化同化功能，在初期缺乏接收客体（群体、民族或国家）的普遍自觉性认同，甚至会遭受接收客体广泛而激烈的抵制。这种政治伦理传播及认同的功效如何，受制于客观社会历史变迁，尤其与传播者的经济、政治、军事及综合实力强大与否，以及影响力和渗透力持续长短有密切关联，民族性或区域性政治伦理极易随着民族主体（尤其是阶级、政治集团和国家政权等主体）的兴衰更替而出现历史性嬗变。因此，直至近代以前，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多元政治伦理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并主要表现为某一社会或区域内部的阶级政治的自我演化、发展及彼此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一方面为各个民族或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④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8页。

政治理念与价值引导,以便为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或争取社会变革作辩护;另一方面也为后世构建全球政治伦理过程中遭遇种种困境埋下了伏笔。

2. 全球政治伦理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以私有资本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国家萌芽、发展并最终确立统治地位,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亦即资本主义时代。在该阶段,“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①逐渐形成,“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政治伦理层面的映射即由商品交换原则衍生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理念和伦理秩序,其借助人类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全球化,开始从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的民族化、区域化的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向全球政治伦理转型与发展。

作为当代全球政治伦理的前身,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伦理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西欧区域历史和时代演化的产物。西欧社会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期间虽然经历了罗马帝国的大一统时代,但由于生产力水平在近代以前较为落后,建立其上的交往关系主要是以封建制为核心的人身依附关系,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在财产所有(主要是土地及其衍生物税收)、政治运行、思想管控等方面并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必须依赖教会的认可、贵族的拥护,其导致的结果是以君主为核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始终没有能够长期有效地建立,君主、贵族、教会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相互依存但又互相争斗。其中,教会作为一种特殊性存在,在西欧多元共存社会格局的形成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亨廷顿认为,“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很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②。多元社会发展格局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层面的表现即分权与制衡、定制契约思想盛行,在政治实践上表现为由于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及彼此之间的合纵连横而引发制度层面的争斗、妥协和变革,如英王在与教皇、本国贵族、法国的博弈中被迫签订《大宪章》,奠定了君主立宪的法律契约基础;法王腓力四世为了对抗教皇而召集教士、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组成三级会议,为法国后续历史中的制宪会议及宪法原则实施做了历史铺垫。这种分权与制衡、定制契约的思想与实践为经由农奴—城关市民演化而来的资产阶级提供了生存、发展和壮大的空间,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在内的西欧各个阶级充分利用已有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谋取条件。霍布斯、洛克等人提出契约思想的依据——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本质上是对市场竞争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凸显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伦理理念的张扬。国家林立的西欧社会现状又为各种政治伦理理念诉诸实践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威尼斯共和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建立,是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和法治契约精神的现实尝试。基于西欧各国之间竞争的需要,一旦一种理念能够成功地为社会财富积累或不同阶级利益诉求提供便利,其必然为他国所效仿和践行。

与此同时,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不仅大大加快了西欧社会的财富积累和工业革命进程,而且促使商品交换关系及其衍生出的政治伦理理念能够通过非洲、美洲等地区争夺和建立殖民统治而继续得以扩张。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欧殖民者大量屠杀殖民地原著居民和强制排除其利益的基础上,以非洲、美洲、大洋洲为代表的海外殖民地作为资本主义“试验场”,逐渐开始挣脱西欧宗主国传统封建所有制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束缚,建立了具有现代雏形的新型资本主义国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演绎出以美国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政治伦理理念。这些挣脱了传统悠久型社会所具有的“历史包袱”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伦理理念和实践方面更具有凶残性、贪婪性、创新性和大胆性特点。因此，这样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正如韦伯和熊彼特等人所说的“群众总是处于现实的纯粹情感的和非理性的影响之下”^①，“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②，精英民主制是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好的治理形式。实用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理论的提出、三权分立式民主制度的建构等，与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缔造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成就。经由数百年的发展，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逐渐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与之相伴随，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平等理念掩盖了资本主义雇佣剥削的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而成为全球流行价值理念，并渗透到现当代国际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之中，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性组织从组织架构、制度设置、价值追求到具体执行举措等都凸显着少数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国家主导的政治伦理取向。

二、全球政治伦理的内在不足与困境

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伦理理念和社会治理秩序，一度为世界各国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祛除传统桎梏，迈向现代化社会提供了价值、制度和实践参考。但这种理念和秩序因其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而始终存在先天局限与后天不足，尤其是面临人类社会异质丛生的民族性与多元利益诉求的挑战，脱胎于殖民地的各个民族国家的大量出现及其平等发展要求，特别是其中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自觉、制度自觉、文化自觉意识日益增强，并基于自身的利益取舍和价值判断对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价值内容及其传播形式、秩序构建的合理性等提出了质疑之时，其内在不足更加凸显。

1. 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先天抽象性、虚假性和阶级性

在西方政治伦理及其主导下的全球政治伦理体系中，基本上都存在对西方自由主义哲学、经济学等思想的运用，而无论古典自由主义抑或新自由主义，它们构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政治伦理理念和秩序的核心原则是对理性、原子化的个人自由或个人利益至上的重视。这种原子化的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的、抽象的个人，是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人，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维护私人利益的政治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反映。卢梭曾指出资本主义自由的虚假性，认为：“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③近代“世界公民”理论的倡导先驱康德指出，“政权形式比起国家形式来，对于人民却是无比地更加重要”^④，康德同时又秉承了霍布斯和卢梭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阐述，认为“唯有共和的体制才是完美地符合人类权利的唯一体制”^⑤。康德虽然力图通过关注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平等与合作而实现世界和平，但其“世界公民”理论和共和国理论依然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现实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尚未脱离西方政治伦理话语体系，无法兼顾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现状。在后续的政治伦理构建中，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民主、平等理念和实践的影响，以及对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11页。

② [美]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15页。

③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1页。

④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9页。

⑤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4页。

资本主义全球政治伦理的反思，西方部分思想家如罗尔斯等人基于实践变化而力图调和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具有某种特色的正义理论、民主理论。在国际政治伦理领域中也出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争论，甚至出现全球伦理^①，培育“世界公民”等理念。但是，以上思想的核心依然是在资本主义视阈下为维护个人利益提供的理论诠释，并且由于无法获得现实国际政治实践的支撑而缺乏说服力。

在大众政治伦理培育方面，借助科技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爆炸，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现象由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劳动生产过程扩展至人的生活过程，乃至人的精神文化领域，在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号召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取向遭受极大解构，尤其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创新不断满足与刺激着人们对各方面的需求和追求，各种虚假的需求在被创造、被宣传中为人们普遍地认可，人们沉溺于这些被创造出来的需求和追求，进而削弱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架构的批判，甚至转为沉默或无意识的认同。这种由工业文明所造就的虚假消费，间接地为资本主义政治伦理的存在提供了便利，而且即使出现对资本主义伦理理论、实践的批判或否定，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也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运行的某些环节而在既定政治伦理秩序之内做出的反应，无法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并与实践进行持续互动，进而无法彻底动摇资本主义政治伦理的主导地位。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消极自由”“大众民主”向“积极自由”“代议制民主（精英民主）”转变。这种政治实践转向，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政治伦理更加成熟与精致，力图从理论和逻辑上编造自身存在的根据；另一方面则更加凸显了其虚假性和阶级性，因为其借助人们对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反思，基本上取消了人民大众直接参与政治伦理秩序构建的可能性，确立了代议制（精英）民主的表面合理性。代议制民主体制和理念造就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并在无形中解构着人们对资本主义政治伦理秩序的反抗。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社会逐渐步入由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性因素造就的“民主困境”，西方政治伦理的阶级性更为凸显，如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活力日益衰减，西方社会陆续出现“政府失败”“市场失灵”、经济增长乏力及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加大、大量失业、公共福利削减等社会问题。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精英统治面临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困难，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不断在社会发展阻滞中受到损害，从而促使资本主义再也无法遮蔽政治伦理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阶级压迫性。以“精英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政治伦理实践不断遭受西方社会内部的广泛质疑，内部分歧与矛盾愈加严重，并再次出现回归“大众民主”的呼唤。虽然此次回归在一些西方国家是以民粹主义、激进右翼主义等消极形式出现的，但它们在理念和实践上挑战了西方社会的既定政治伦理秩序，形成了在其既定政治伦理秩序内的新型反秩序潮流。

2. 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后天盲目性、霸权性及矛盾性困境

当代全球政治伦理在价值理念及制度维护上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政治伦理内在的阶级性及其产生的种种问题的反映，表现为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盲目性和霸权性。同时，作为一种他者的异质文明，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始终在其他国家面临再本土化的挑战。

在当下乃至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它们彼此之间始终存在差异性和多元性，“全球的资本主义可能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

^① 参见赵景来：《关于“普遍伦理”若干问题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国家则有时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①，全球政治伦理与具有区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宗教伦理之间存在排斥和张力。当代全球政治伦理突出地表现为西方式政治伦理外溢和扩张的过程，发达国家在全球政治伦理制度构建、价值理念传播方面具有话语霸权和舆论强势，发达国家及其内部衍生出的国际化组织、跨国公司、精英人物等，能够基于自身财富、理念、经验等而在其他非发达国家面前形成话语优势、舆论强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本国文化软实力乃至相关产业建设，注重从自身文化中汲取有利于现代化或维系本民族、本国生存的要素，传统、宗教、习俗乃至历史遗留的积极因素不断获得挖掘与发展，传统性与现代性得到整合，并被以各种途径应用于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新兴国家与社会的民族自觉、制度自觉、文化自觉和个体自觉意识日益觉醒与增强。因此，非西方化、区域性、民族性政治伦理不断在兼具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特点中生成和发展，如东南亚等地区现代政治伦理的不断生成；众多伊斯兰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着传统伊斯兰教影响下的政治伦理理念和制度；非洲、西亚地区的部落政治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结合本国实际而形成了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理念的多元文化的理解，并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本土化探索，力图使人们了解，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理念的普遍认同并不等同于对西方社会所提倡的、有特定内涵的所谓“普世价值”的绝对认同。

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扩张与非西方化政治伦理崛起，二者之间构成了当代全球政治伦理的矛盾和碰撞。在全球政治伦理语境和逻辑中，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应当是各国共同遵守的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倘若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是一种开放、积极、和谐的伦理目标和制度引导，那么它必然会承认乃至认同这种同质化与多元化并行的全球政治现状，尊重非西方国家对现代政治伦理的本土化发展，并客观评价与对待非西方政治伦理在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但实践证明，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始终无法摆脱西方社会内部生发出的资本逐利性和阶级性的束缚，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层次推进，当代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阶级性更突出地跨越国家和民族边界，为资本全球性扩张和利益最大化提供服务。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为标签的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所具有的内在阶级性决定了其在理论和逻辑上的封闭性——西方中心主义在实际中受到盲目推进，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出现了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外在张力。西方国家始终以双重标准审视其他国家政治伦理做出的选择与行为，其在理念传播和实践构建中不切实际地盲目排斥其他民族化、区域化的政治伦理，并运用各种途径推广西方式政治伦理理念和制度，甚至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将其强加于其他国家或民族。这种具有盲目性和霸权性的全球政治伦理实质上延续了西方政治伦理的抽象性，削弱了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现实说服力和合法性，并力图解构作为始终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阶级属性，即无视处于各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国家等阶级构成的特殊性，由此衍生出人权与主权、自由民主与威权独裁等国际对立判断和双重标准。在实践上，西方社会基于资本利润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在国际政治活动中无法“身体力行”地践行其所倡导的全球政治理念，它们随意践踏既定的全球政治制度和价值原则，甚至屡屡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应对争议。核威胁、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种族冲突、宗教冲突、贸易冲突、局部战争、贫困与疾病等全球化问题长期存在且难以解决，在很多时候与西方国家背离自身所倡导的全球政治伦理理念和秩序直接相关。这导致非西方国家提出了普遍质疑：全球政治伦理究竟是兼顾公平地保障着各个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和制度安排？抑或仅仅是西方国家维护自身

^① [美] 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9页。

利益的工具?

“人们在努力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普遍伦理，而这种寻求的热望正被文明可能发生冲突的阴影弄得愈发迫切。”^① 在西方式政治伦理存在双重标准的情况下，非西方国家基于当前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虚假性而对其不断产生反弹和否定，并在寻找和诉诸其他的比较合理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理念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无产阶级政党在亚欧一些国家获得执政地位，它们基于消灭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等共同原则，借助党派、国家之间的交流活动，通过经济互助、政治与军事合作、文化交流，逐渐构建起独立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之外的区域与国际合作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众多第三世界国家陆续摆脱在政治上被西方国家殖民的状况，得以谋求经济和文化的独立。万隆会议顺利召开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共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伦理方面极为重视平等与合作，也是对当时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秩序的反抗。在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其后苏东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政治伦理渗透和诱压下，相继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与其说是西方政治伦理的有效性，不如说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强势性及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所导致。社会主义中国能够顶住这股政治逆流，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

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的严峻程度有增无减，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基于利益分化组合而导致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类型和形式更为多样（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本身是全球政治伦理秩序失衡的结果），人们对以民主、自由等为核心的西方式政治伦理理念、制度及其实施过程、后果进行着持续反思。在面对传统型和非传统型相互交织的国际政治秩序之时，基于自身利益诉求或价值判断（其中也包括对当前全球政治秩序的不满或丧失信心），以国家为主体力量的反全球化倾向日益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引发的贸易争端逐渐增多。以恐怖袭击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则以非对称形式凸显了全球性政治伦理与民族性、区域性政治伦理之间的冲突。种种传统性和非传统性全球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在于全球政治伦理及其秩序构建存在的弊端，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治理的失序和国际协作的失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才应运而生，大有可为。

三、“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政治伦理变革中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必然产物。它提倡和平与共享的经济观，尝试挣脱“资本至上”的经济全球化法则，增添了当前全球政治伦理所缺乏的平等意蕴。其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中国的实践成就和制度探索，增强着它的现实说服力，为当代全球政治伦理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1.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政治伦理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依据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发展逻辑造成了全球政治伦理的发展困境。在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出于资本家个人、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的自身的利益诉求，国际性矛盾与冲突在很多时候也源于这种社会发展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促使“世界市场”形成、推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同时，又造就了全球性战争、掠夺、剥削等不平等现象。协调或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全球健康、和谐发展一直是真正的全球政治伦理的内在价值要求。作为对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批判与否定，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提倡国际合作尤其是无产阶级政

^① 何怀宏：《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读书》1997年第4期。

党、国家之间的互助协作，并采取无偿援助、合作交流等形式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法则，但其没有能够建立长效、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国际合作机制。本应构成全球政治伦理新内涵的社会主义民主、平等、互助等理念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而被极大地削弱了影响力，最终未能确立并发展起来。至于由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构建的区域性或全球性合作机制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合作组织内部的松散性、合作效率的低下等导致其依然无法撼动资本主义对全球秩序的主导地位，其倡导的理念自然也难以传播。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逻辑延伸，“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与机制，即针对由资本积累造成的空间层次的剥削——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不平等发展，尤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南北贫富差异及其引发的全球政治伦理问题，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以自主改革与开放合作相结合的形式实现对这些问题的缓解乃至消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获得了广泛认同”^①。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以和平方式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方式，作为对它的传承与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和平与发展理念。与现当代其他国际或区域合作机制不同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以自愿、包容与开放的原则接纳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积极参与，其核心价值理念旨在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倡导积极的合作与发展观，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并不存在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逼迫或诱使某一国家或地区参与进来，也不是针对某一个或几个国家而结成的地缘政治集团。“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实现这种和平发展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西方社会存在的资本积累逻辑的局限性。“一带一路”倡议实质上回答和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历史性疑问——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和对待资本的影响与作用，即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双重历史作用的科学评价，并将该思想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审视并解决当代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一般趋势，同时在作为发起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推动之下，“一带一路”倡议在理念和实际运行中注重对资本逐利性的强烈约束。在“一带一路”倡议视阈下，国家不仅是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而且是本国资本合法利益的守护者，更是引导、规范资本的主导者，其在对彼此之间关系的协调中能够有效约束资本逐利的盲目性——沿线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虽然依然呈现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以资金、技术、资源、产品、劳动力等互补性为交流契机和合作基础，追求各自的民族经济发展和正当的利益，并由此形成各自的分工角色，但在共建过程中，无论是合作交流，还是援助帮助都没有附加条件。由“一带一路”倡议分工体系形成的发展互补性，并不意味着为了促进市场化、追逐短期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忽视当地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也不意味着促使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形态固定为某一单纯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模式，造成各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作为摆脱了资本积累单向逻辑的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相关国家的优势与潜力，在保障各参与国能够独立自主选择并彼此尊重各自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扬沿线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特色和地缘优势。尤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参与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自主改革、充分保障本国经济利益，提供了一条区

^① 《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人民日报》2014年11月7日。

域或全球合作路径。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与协调平台，各参与国能够采取基础设施投资、劳动力素质提升、市场培育、技术变革激励等举措，促使各个地域或国家共同体在内部形成均衡、健康、完善的社会生产体系。各参与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平等、合作与发展的机制之下，在国内能够采取种种适合自身需要的改革举措，探索和增强本国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以适应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并与区域、国际合作体系形成良好互动，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采取互惠合作、援助方式，有效地平衡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真正实现交往过程中的互利与互补。在此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随之减少甚至能够得到有效规避和解决，最终实现各国国内国际的协调发展，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积极成果。

2.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政治伦理变革的实践和制度依据

“一带一路”倡议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实际行动和制度探索为全球政治伦理观念的变革提供启示。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为个人、社会、民族或国家提供发展与进步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当代全球政治伦理的主要职能，也是一个共识性政治伦理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说服力所在。当代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现代化路径由于经济增长乏力而引发的社会系统性问题无解，以及在其标准化政治伦理体系指导下的社会变革实践无法完全普遍地适用于每个国家，进而引发人们对其进行反思和质疑。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与推进的现实条件之一，增强着“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政治伦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现实说服力。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和一般思维模式，在实践和制度创新方面体现了中国对改革与开放二者关系的科学把握。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进行积极的借鉴与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包含有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总结与反思。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注重培育自身的发展风格与特色，避免物质财富增长（手段）与人的全面发展（目的）之间的错位，在推进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将“看不见的手”（市场）与“看得见的手”（政府）的作用进行有机结合，并进一步将二者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演绎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民性”价值取向，“人民至上”原则在政治伦理层面构成了对“资本至上”的超越和否定，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当代中国的价值表现；注重探索增强和改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汲取古代中国、当代世界各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经验教训；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理念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在兼收并蓄的改革与开放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重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并不排斥国外优秀经验和先进文化，同时极为注重将现代化一般经验与中国实际发展道路、制度构建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在持续调动社会活力与积极因素中形成系统性合力。中国社会不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在兼具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双重特点中不断完善。一系列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推动全球政治伦理的实践发展和制度建设的现实说服力。

中国社会始终坚持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实践态度，注重尊重各国和各个民族平等发展、自主发展的基本原则，从不以经济、政治、军事等实力挤压或威胁他国的生存空间，从不将本国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治理理念强加于他国，更没有以任何形式干涉他国内政。换言之，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并不在中国对外开放与发展的实践之中。中国社会在关涉本国与全球利益之时所坚持的公平、平等、公正做法，是当代全球政治伦理中的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重新合二为一的突出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①

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非西方国家提供的启示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单一的，以“普世价值”自诩的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及其指导下的发展模式并不能够无差别地复制和适用于其他国情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尤其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这样。所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人民至上”的原则，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伦理及其指导下的、健全的国家治理体系，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其他国家汲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而“融入”与“汲取”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地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实际行动和制度探索为非西方国家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借鉴——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平台建设，在平等基础上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国内自主改革与对外积极开放的双向互动，共同改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平等状态，进而逐渐扩大各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构建健康和谐的、能够不断实现人类共同福祉的全球政治伦理体系。

总之，在当今全球政治伦理由于其内在不足和缺陷而面临困境和挑战之际，“一带一路”倡议理念为其提供了解决思路和改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为了维系西方少数大国的霸主地位，必然对其他政治伦理采取排斥、打压等措施，作为正在走向全球化的政治伦理，中国所倡导的一系列全球性政治伦理主张和实践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且困难的历史过程方能得到普遍认可和借鉴，全球政治伦理的变革与重塑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1] 万俊人主编：《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IV）伦理学前沿：道德与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 [2]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3] 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 [4] [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 [5]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6] 李丹：《论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 [7] [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编辑：张 剑）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